

善自得师、仕宦经历与周之琦的词学风貌*

杨柏岭

内容提要 善自得师、身为大吏、性耽风雅的周之琦，论词与创作均呈现独特风貌。其论词于清代浙西、常州词派之外，承中原之统，无门户之见，跳出流派批评阈限，着眼小令与慢曲等词体体制，编选词集，缕述词统，倡导托兴与音律并重、天籁与人工并举的词学审美观。其填词及词集编选，在展示社会风俗图景、抒写真情实感的同时，亦哀生悯世，若有隐忧；词作构思严谨，善于起承转合之章法，多用主谓结构句式以及对仗、对比手法，表现出“词中八股”的严整风格。特殊的政治身份，既滋养着周氏词学本身，也对接受者产生影响。

关键词 周之琦 仕宦经历 词学

周之琦（1782—1862），字稚圭，河南祥符人，嘉庆十三年（1808）进士，为官四十余年，官至刑部右侍郎、广西巡抚。他成长于读书科举世家，其兄周之瑀“豪于文”，而他自己“兼擅词翰”，“时称开封二周”^①。周之琦工诗善画，尤专精于词，时人或以“将相兼才调”^②誉之，后人有“实乾嘉词坛中之关键人物”^③的赞誉。然研究者囿于流派批评的套路，对其词心的把握多有偏离。兹立足其善自得师的治词路数以及长年仕宦的人生经历，从不落流派窠臼的词学主张以及平生境遇系于词的创作倾向入手，揭示其词学风貌，反思词学流派批评模式之弊，探析词家政治身份对词学活动的影响。

一 “善自得师”与不落流派窠臼的词论旨趣

周之琦编有《晚香室词录》《心日斋十六家词录》这两部词选，中有词论集评与批注；选刻纳兰《饮水词》，撰有序跋；《心日斋十六家词录》各系绝句一首，词简意精，所论“皆能得其真詮”^④。由于周氏不是采用词话类著作来明确表明其词学主张，加之百余年来对盛行的流派批评范式缺少反思，因此学者们对其词学面貌的认识出现了一些混乱的现象，甚至既云“折衷浙派而接近常州词学观”，又说“与‘浙’‘常’二派没有什么关联处”^⑤。流派批评对于文学研究的深化，“既有认识论的价值，又有方法论的价值”^⑥；但部分研究者的流派先行意识对文学史研究形成一股劫持力量，既有以流派整

* 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清代乾嘉以降词史演进的文化考察”（项目编号12BZW055）阶段性成果。

① 周汝筠、周汝策《稚圭府君年谱》，《北京图书馆藏珍本年谱丛刊》，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9年版，第138册，第155页。

② 程恩泽《程侍郎遗集》卷六《题周稚圭前辈金梁梦月词八首》（其一），《续修四库全书》，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1511册，第268页。

③ 朱庸斋《分春馆词话》，广东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84页。

④ 陈匪石《声执》卷下，《词话丛编》，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5册，第4966页。

⑤ 严迪昌《清词史》，江苏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第12、493、496页。

⑥ 杨义《流派研究的方法论及其当代价值》，《湖南师范大学学报》2001年第5期。

体风貌遮蔽文学史事实的行为，也有强行将那些原本无派的作家纳入派别话语体系中加以解读的现象。从某种意义上说，周之琦卒于同治元年（1862），跨越乾隆、嘉庆、道光、咸丰四朝，这期间正是浙、常词派此消彼长的阶段，故以词派视角考察他的词学观，似为知人论世之举，只是这对原本无派的周氏词学来说，虽可谓“论世”，却不可谓“知人”。

（一）“善自得师”的词学路数

周之琦早年除继承家学外，还“学于大梁书院”^①。但据目前所掌握的资料，他在词学上主要依靠自学。其于“诗古时艺，靡不纯粹以精”，然“不甚重之”，“惟于制词最为专精，自得万阳羨《词律》，愈益精进，久之复别有神悟”^②。其自言“性好倚声”，其所编《心日斋十六家词录》，“皆平生得力所自，辑而录之，取便观览，非谓古人佳制尽于是也”^③。《陌上花》（烧槽断后）词序说，因自己与李煜同以七夕生，故填词“尝瓣香李氏，实寓窃比之意”。《青衫湿遍》（瑶簪堕也）词序亦说其“偶效纳兰容若词”。正因为周氏治词尤重自修，故顾宪融称其“善自得师”^④。

此番治词路径与周氏平生读书、立身、行事风格颇为一致。其“一生行趋规步而绝无迂拘之迹，并且廉而不刻，介而自和”，“凡所遇合皆由真能知己”^⑤。如其署浙江按察使时，廉访佟镜塘“好言理学”，周氏“谓徒言无益，必须躬行”。佟公始颇不以为然，嗣见周氏行事，乃喟然曰：“君不言理学而行理学，斯为真理学也。”^⑥林则徐在《密陈周之琦胜任湖北巡抚片》中，亦云周氏“操守清廉，性情朴直，于属员不假辞色，于公事不许通融”，“议论公事，亦能自抒所见，不稍依阿”^⑦。而周氏以“心日斋”命其室名，亦如其《鸠拙而安赋》所云：“士有守恬和，慎取舍，心自洗于退藏，志必祛夫满假。知足为贵，而履蹈常贞；即事多欣，而悔尤可观。”^⑧可见，“心日斋”之名反映出周氏不稍依阿、必须躬行、履蹈常贞的品行。

周氏以日日洗濯己心为座右铭，不仅体现在他善自得师、别有神悟的问学历程中，而且启示后人不宜据流派、门户之见来看待他的词学主张。对此，刘毓盘评周氏《心日斋词》时便有过揭示：“一字不苟，觉厉氏于律之疏也；一往而深，觉张氏于意之浅也。周氏，大梁人，可以接中原之统矣，而无门户之见者，亦曰文无古今，惟其是而已。”^⑨所谓“接中原之统”，与周氏为大梁（今开封）人有关；但从华夏文明源流史上说，刘氏也在强调周氏治学的寻根意识与正统观念。这在派别林立且多以南方地域流派为主的清代词坛，彰显着一种跳出派性思维与区域性词学格局的气魄，反映出一个中原士人的学术视野、治学态度以及独立的审美眼光，其词史意义不可低估。

（二）基于词体体制的词统建构

首先，从词选的编写意图及特点来看。《晚香室词录》八卷钞本选录唐宋金元词123家650首，《心日斋十六家词录》二卷选录晚唐宋元词人16家403首。两部词选繁简有别，但均以时间为序，限于由唐至元的范围，殿以元代张翥，批注中对词人的认识亦相近。不过，赵尊岳谈到《晚香室词录》时说：“所选吴文英四十三首，史达祖二十六首，姜夔二十三首，张炎二十一首，为最多，周密仅九

① 刘卫东、高尚刚编著《河南书院教育史》，中州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第63页。

② 《稚圭府君年谱》，《北京图书馆藏珍本年谱丛刊》，第138册，第141—142页。

③ 周之琦《心日斋十六家词录自识》，吴熊和、陶然辑《清人论词绝句》，吴熊和主编《唐宋词汇评（两宋卷）》，浙江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第5册，第4407页。

④ 顾宪融《无师自通 填词百法》卷下，中原书局1931年版，第113页。

⑤ 《稚圭府君年谱》，《北京图书馆藏珍本年谱丛刊》，第138册，第135—136页。

⑥ 《稚圭府君年谱》，《北京图书馆藏珍本年谱丛刊》，第138册，第138页。

⑦ 林则徐全集编辑委员会《林则徐全集》，海峡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2册，第1008页。

⑧ 周之琦《珠巢存课》卷上，《清代诗文集汇编》，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第540册，第443页。

⑨ 刘毓盘《词史》，上海书店出版社1985年版，第502页。

首。金元人所取亦多。”从“选法谨严”角度来看，周氏“盖出诸常州宗派者也”^①。陈匪石则认为《心日斋十六家词录》“于苏、辛一派，均无所取，则仍浙西家法耳”^②。这看似是两部词选旨趣不同或是周氏词学观的自身冲突，实则由于论者心中横亘着一种宗派的观念。同时，这种依据选目及比例逆推编者宗派属性的思路，并不具有普遍性。如张惠言《词选》不取吴文英，周济《宋四家词选》却视之为宋四家之一。若按上述思路，张、周当分列两派矣。

龙榆生曾云词选功能，“一曰便歌，二曰传人，三曰开宗，四曰尊体，前二者依他，后二者为我”^③，虽道出了词选的特点与价值，但同样不能将其普遍化。周之琦就曾明言，其编选词集并不是为了门户之见的“开宗”，而是“取便观览，非谓古人佳制尽于是也”。可以说，周氏选择了一种“不限一轨，家家皆是法门”^④的词选门径。即便认为《心日斋十六家词录》乃浙西家法的陈匪石，通过与戈载《宋七家词选》比较后，亦不得不承认其“门户加宽，且已知崇北宋矣”^⑤。当然，无论编选者最初动机是什么，选本对后人来说还是在展现一种历史，周之琦选词同样展示了他心中的一种词史模式。他曾云：

词之有令，唐五代尚矣。宋惟晏叔原最擅胜场，贺方回差堪接武，其余间有一二名作流传，然皆专门之学。自兹以降，专工慢词，不复措意令曲，其作令曲，仍与慢词声响无异。大抵宋词闲雅有余，跌宕不足。长调则有清新绵邈之音，小令则少抑扬抗坠之致。盖时代升降使然。虽片玉、石帚，不能自开生面，况其下者乎？^⑥

周氏这种从令、慢等词体演变角度构筑的词史模式，在《心日斋十六家词录》中得以践行：因令曲以唐五代为尚，故录温庭筠、李煜、韦庄、李珣、孙光宪五人 117 首；鉴于令曲在北宋的发展情形，录晏几道、秦观、贺铸、周邦彦四人 104 首，其中晏几道“最擅胜场”，故录 46 首，居十六家之首；因南宋以来词家专工慢词，故于清真以降便专取慢词。对此，谭献誉其“截断众流，金针度与。虽未及皋文、保绪之陈义甚高，要亦倚声家疏凿手也”^⑦，还看出他“喜收疏爽小令”^⑧的特点。陈匪石认为“周氏之论至当”，只是在小令的认识上，“惟未必无抑扬抗坠之音而已”^⑨。然而，周氏对令、慢盛衰之变的认识，并不意味着他重令曲而轻慢词，崇唐五代而贬宋代。因为令、慢之变乃时代使然，周氏只是从各自优胜处选择论断。因此，与《词综》以清空、雅正为宗，《词选》以意内言外、比兴为旨等彰显宗派的编选意图有别，周氏则在尊重词体艺术发展史的同时，已有消解宗派化词史模式的倾向。

其次，从“十六家题辞”的相关论述来看。周之琦论晏几道曰：“宣华官本少人知，《珠玉》传家有此儿。道得红罗亭上语，后来惟有《小山词》。”陈匪石曾曰“小山学《花间》，妙在吞吐含蓄，全不说破”，但亦有“爽利一派，已开慢曲门径”，“至其疏而不密，劲而不挠，全从李煜得来”，“周之琦所谓‘道得红罗亭上语’，其在斯乎”^⑩。可见，周氏正是立足令曲的发展史，指出小晏词兼承“花间”“南唐”两大传统，又从李煜处习得慢曲之法，揭示出小晏词独特的词史地位。宋人令曲自晏几道后，“贺方回差堪接武”，故周氏论贺铸云：“雕琼镂玉出新裁，屈宋媼施众妙该。他日四明工琢

① 赵尊岳《词籍提要》，《词学季刊》1935年第2卷第3号。

② 《声执》卷下，《词话丛编》，第5册，第4966页。

③ 龙榆生《选词标准论》，《龙榆生词学论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59页。

④ 肖鹏《群体的选择：唐宋人词选与词人群通论》，凤凰出版社2009年版，第467页。

⑤ 《声执》卷下，《词话丛编》，第5册，第4966页。

⑥ 杜文澜《憩园词话》卷二，《词话丛编》，第3册，第2865页。

⑦ 谭献《篋中词·今集》卷三，谭献辑，罗中鼎、俞浣萍校点《清词一千首》，西泠印社出版社2007年版，第122页。

⑧ 谭献著，范旭仑、牟晓朋整理《复堂日记》，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310页。

⑨ 《声执》卷下，《词话丛编》，第5册，第4966页。

⑩ 陈匪石《宋词举》，金陵书画社1983年版，第123—124页。

句，瓣香应自庆湖来。”肯定了贺铸继往开来的词史地位。“众妙该”云继承，延续张耒《东山词序》“盛丽如游金张之堂，妖冶如揽嫫施之祛，幽索如屈宋，悲壮如苏李”之说；“出新裁”说拓展，指出贺铸词由天籁本色向人工思力演变的词史信息，后来梦窗的“工琢句”便是瓣香贺铸的体现。当然，贺铸词风多样，周氏从“雕琼镂玉”嵌入，又给人“犹是皮相”^①的口舌。贺铸之外，周邦彦亦是两宋词风之变的关键人物，但历来褒贬不一。褒者誉其知音，赞其词有法度，无美不备，开南宋雅词之先河；贬者斥其品行不端，词品不贞。对此，周之琦态度极为鲜明：“宫调精研字字珠，开山妙手诂容诬。后生学语矜南渡，牙慧能知协律无。”盛赞清真词恪守音律以及开启南宋词风之功，批评后来学南宋者乃拾人牙慧，守护着清真词的模范地位。

如果说周之琦论晏、贺、周等人，重在强调他们在词史演变上的关键作用，那么论元代张翥词，则彰显其追寻一灯不灭的词统观念：“谁把传灯接宋贤？长街掉臂故超然。雨淋一鹤冲霄去，寂寞骚坛五百年。”戈载曾言：“元惟张蜕岩称最，明则一代无词。”^②周氏进而指出张翥早年隐居扬州，长街掉臂，未受官场束缚，词风超然，能接续宋贤词统；然自从一鹤冲霄，走进大都，飞黄腾达之后，词风便一蹶不振。自明末卓人月、徐士俊《古今词统》后，“词统”渐趋成为词家考察词史的重要方式。然与张惠言《词选序》所认为的“自宋之亡而正声绝，元之末而规矩隳”，“以至于今四百余年”的词人“皆可谓安蔽乖方，迷不知门户者”^③不同，周之琦则将宋贤词统断于元代张翥，其所谓“五百年”，实则否定了浙派、常派接续唐宋词统的努力，反映出他独自构建词统的用心。

（三）托兴与音律并重的创作主张

表面上看，周之琦于浙、常等词学均有汲取，亦皆有批评，然若说他是折中、调和、包容论者，不如云其为自抒所见者。如在周氏看来，“方山憔悴彼何人，《兰畹》《金荃》托兴新。绝代风流《乾巽子》，前生合是楚灵均”，温庭筠以憔悴之身借侧词艳曲寄托新意，其遇、其才乃屈原之再生。如果说温庭筠风流其表、憔悴其里，托兴其不遇之感，那么蒋捷就是凄凉其身、气节其骨，寄托其故国之思：“阳羨鹅笼涕泪多，清辞一卷黍离歌。红牙彩扇开元句，故国凄凉唤奈何。”蒋捷出身巨族，宋亡隐居不仕，气节为时人所重。周氏运用阳羨鹅笼典故，既因蒋捷为阳羨人，又因这个幻中生幻的故事可寄托蒋捷的黍离之悲、身世之感。不过，“托兴”说虽为常州词派所主张，并非其独有。其实，若周氏真自诩常州词派成员，那么就不会说出自元代张翥之后“寂寞骚坛五百年”这样的话来，而应像陈廷焯等清末常州派词家那样，视张惠言为唐宋词统的接续者。

同样，周氏对清空、灵机、骚雅、音律等问题的讨论，也有延续浙西派及嘉道吴中词学风气的痕迹，但无不渗透着自己的独立思考。如论张炎曰：“但说清空恐未堪，灵机毕竟雅音涵。故家人物沧桑录，老泪禁他郑所南。”此评质疑清空说，或认为以常州词派弥补浙派词论之不足，但更应是以张炎雅词理论重释他的创作。人们熟知张炎“词要清空，不要质实”的说法，然而既未能真正重视其“不惟清空，又且骚雅”“清空中有意趣”^④等论断，又多从洒脱、空灵层面解读“清空”，致使片面把握了张炎词学观。如郑思肖（所南）《玉田词题辞》既说他欣赏张炎早期“一片空狂怀抱，日日化雨为醉”的生活，又说张炎后期于西湖锦绣山水中“自生一种欢喜痛快”。郑氏之评，或认为故作反语，以示张炎悲痛之深长；然正如夏敬观所说，此评乃“疯狂之语，似通未通，开明季恶风气之先”^⑤。而在夏氏之前，周之琦已表明禁止郑氏言说权的态度。因为除了清空，灵机、骚雅、意趣

① 杨希闵《词轨》卷五《题识》，屈兴国编《词话丛编》（二编），浙江古籍出版社2013年版，第2册，第1187页。

② 戈载《知止堂词录序》，朱绶《知止堂词录》，《清代诗文集汇编》，第563册，第108页。

③ 张惠言《词选序》，《词话丛编》，第2册，第1617页。

④ 张炎《词源》卷下，《词话丛编》，第1册，第259—260页。

⑤ 夏敬观《映庵词评》，《词学》（第五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

乃至音律，也是张炎雅词观的固有内涵，更何况张炎词于“清空”中内敛“沧桑录”，并非一种“空狂怀抱”或“欢喜痛快”。关于音律，张炎《词源》云：“古之乐章、乐府、乐歌、乐曲，皆出于雅正。”而稼轩、刘改之“于文章余暇，戏弄笔墨，为长短句之诗”的“豪气词，非雅词也”。张祥河《心日斋十六家词录序》云其平生“辨鬲指声，心折红友”，程恩泽称其词“声律精严，为词家第一”^①，周氏《心日斋十六家词录》不取苏、辛等名家词，除了风格上的考虑，还有就是协音律的问题。

可见，周氏论词对前代的延续与吸收，多以反思为主。又如针对张炎“词要清空，不要质实”的说法，周氏既云“但说清空恐未堪”，又借推尊吴梦窗词辨析了“质实说”。周氏《心日斋十六家词录》选梦窗词42首，数量仅次于晏几道，并特加附语曰：“梦窗词自张叔夏‘不成片断’之论出，耳食者群然和之。余谓梦窗格律之细，方驾清真；意境之超，希踪石帚，断非叔夏所能跂及。”其论梦窗又云：“月斧吴刚最上层，天机独茧自缢冰。世人耳食张春水，七宝楼台见未曾。”用吴刚月宫伐树的传说，既与吴姓有关，也是通过隐喻梦窗词的匠心独运，质疑张炎的“七宝楼台”之说。宋代之后，推尊梦窗者大多难以与张炎“质实”“七宝楼台”之讥决裂，像晚清朱祖谋、况周颐等自诩梦窗知音者，也是以“密”“涩”来彰显梦窗词的质实之美。而周之琦则指出工琢句的梦窗词，不仅是天机自化，更有格律细、意境超的一面，这就从立论前提上破解了张炎拴在梦窗词上的枷锁。

（四）天籁与人工并举的审美理想

纳兰曾言“《花间》之词如古玉器，贵重而不适用；宋词适用而少贵重，李后主兼而有之，更饶烟水迷离之致”^②，故论者多视其“得南唐二主之遗”^③。然而尽管对纳兰词有过研究的周之琦认为纳兰小令“格高韵远，极缠绵婉约之致，能使南唐坠绪绝而复续”；但从词史上看，“重光，天籁也，恐非人力所及”，后来传李煜衣钵者，除了小山，还有贺铸，故云纳兰“第其品格，殆叔原、方回之亚”，不堪“南唐李重光后身”之誉^④。如此推尊李煜，还有他自诩的与李煜同以七夕生的特殊因缘。因此，他评李煜便多体验之语，且尤重李煜后期那些涉及国破、家难与情愁的词作：“‘玉楼瑶殿’枉回头，‘天上人间’恨未休。不用流珠询旧谱，‘一江春水’足千秋。”所论意在告知读者，李煜词乃饱含生命体验的天成之作，非模拟者之人力所能及。除了李煜词，秦观词也有天生香韵：“淮海风流旧有名，红梅香韵本天生。痴人不解陈无己，黄九如何得抗衡。”周氏《喜迁莺·红梅》词自注曰：“淮海词如红梅作花，能以韵胜。”识见若此，故他批评陈师道“今代词手惟秦七、黄九”将秦、黄并称之言，实为痴人说梦。除了批评“秦、黄”并称说，其论王碧山时又指出“姜、史”“姜、张”并称说，也只能是“饶人耳目”。在他看来，当以碧山、白石并称为宜，因为白石词乃“人间别有藐姑仙”，惟有“碧山才调剧翩翩，风格鄱阳好并肩”。

清真等人能“宫调精研字字珠”，贺铸、梦窗等人于雕琼镂玉中能自蕴机杼，而李煜词的“天籁”、秦观词的“天生”、姜夔词的“藐姑仙”更具天纵之美。这种以自然为贵而不弃人工的词学艺术论，还反映在他对词家才调的尊重上。如韦庄曾至临川寻求政治理想，然草草收场，于是周氏论曰：“《浣花集》写浣花笺，消得孤篷‘听雨眠’。顾曲临川还草草，负他‘春水碧于天’。”感慨韦庄对人生际遇的把握不及其才情的展示。与此相对的是，史达祖平生未中第，始任幕僚，一度为权臣韩侂胄堂吏，周氏评曰：“长安索米漫唏嘘，秘省申呈不负渠。泉底织绡尘去眼，当时侍从较何如？”既认为史氏能以侍从得到重用，本不该叹息，又认为史词有张镃《梅溪词序》所说的“织绡泉底，去尘眼中”之美，更无需叹息。前者明显带有周氏身为“大吏”的规诫口吻，后者体现出尊重艺术本位的批

① 李敏修辑录，申畅总校补《中州艺文录校补》，中州古籍出版社1995年版，第15页。

② 纳兰性德《渌水亭杂识》卷四，刘献廷等《清代笔记丛刊》，齐鲁书社2001年版，第1册，第441页。

③ 冯金伯《词苑萃编》卷八引陈维崧语，《词话丛编》，第2册，第1937页。

④ 金梁外史《饮水词·识》，张秉戌《纳兰词笺注》，北京出版社2007年版，第523页。

评原则，实已反映下文将分析的周氏“将相兼才调”的艺术心理。

至此，周之琦论词在音律与词章（托兴）、人工与天籁、才调与性灵两极之间，既以词体体制为淮的，又以天纵之美为旨归，反映出他对词体特殊性以及中国艺术精神之正统的尊重。当然，对“廉而不刻，介而自和”的周之琦而言，说他论词具有消除宗派意识的倾向，并非说他不曾受到某些派别词学观点的影响，而是说与其从词派角度考察其于词史诸派的折中、调和与包容，不如说他更能彰显出一种取舍调停之外“能卓然自树者”^①的独立品格。

二 仕宦经历与政治情怀的主题呈现

词家围绕词体功能一直争论不休，但不断拓展词境成为词家为词之用心的共同选择。简言之，由娱情功能的空中语、伶工之词，向抒情、言志功能的诗人之词、士大夫之词拓展，直至将词体功能扩展为足以反映人生全部的一种文学样式。在这一点上，注重躬行实践、善自得师的周之琦同样表现出不俗的一面。其《心日斋词》六卷四百余首，亦如同时另一大吏词人陶梁一样，“举生平境遇，自系以词”^②。《金梁梦月词》二卷收嘉庆十七年（1812）至道光元年（1821）春居京为官及奉使太原时的作品；《怀梦词》是道光九年（1829）夏、秋悼亡妻沈氏之作；《鸿雪词》二卷收道光二年至二十七年（1822—1847）外任及期间回京述职时的作品；《退庵词》是道光二十七年至咸丰十一年（1861）休官终老家乡期间所作。文学是人学，“是人性与人情的学问，是人生和心灵的学问”^③。在周氏的个体生命中，仕宦经历及人生体验尤为突出，其词学人生正如张祥河《心日斋十六家词录序》所描绘的，“金梁外史，海内词宗，乌帽红萸，玉簪罗带，移舟画里，就梦诗边，含情在中，袅笔无际”。兹撷取数端，从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自我及社会的关系中窥探其词中仕宦人生的主题风貌。

（一）仕宦酬应交游词的“宣南”情结及政治心态

周之琦为官四十余年，居京与外任几近各半，其性耽风雅，喜赋咏，唱和交游甚浓。同治二年（1863），苏汝谦《雪波词自叙》曾回忆早年在周之琦幕中，“花朝月夕，时闻绪论，稍识此中门径”，感慨“军门清燕，拓戟高歌，承平风景，何可复再？恨不得向梦月词人面质之也”^④。当然，仕宦者多酬应、交游篇什的风气，多为论者诟病。虽说这些词作也有纪事、写景及抒情言志的内容，但从周之琦词序中屡见“赋此代柬”“以代逋卷”等语来看，酬应交游本就是他的填词动机。据考，周氏官场酬应范围较广，但主要还是以同辈间的交游为主。个中缘由，丁绍仪有过揭示：

词家萃于一榜，莫盛于嘉庆戊辰（1808）。如陶兕芑宗伯、周稚圭中丞、刘芙初太史与嘉兴钱星湖给谏仪吉、阳湖赵树三比部植庭、吴县董琴南观察国华、钱塘屠琴坞太守倬，均有词稿刊行。^⑤

丁氏所言，可谓清末词坛甚为难得的景观，上述人员也正是周之琦词中最重要的交游对象，本具有词史意义。然更须注意的是，嘉庆戊辰榜进士不仅词家极多，而且他们中的部分人还是宣南诗社前身——消寒诗社的第二批重要发起者^⑥。这也是这个词人交游群相对稳固的深层原因。对此，周之琦于嘉庆十七年（1812）在《瑞鹤仙》（素天分雁轸）词序中记载甚详：“屠琴坞旧寓米市胡同双藤老屋，诸同志时时觞咏其间，距今三载矣。……尔时同集者刘芙初、董琴南、朱勋梅、谢向亭、钱衍石、贺耦庚、琴坞及余为八人，皆戊辰同年友也。”周氏于京城居所由琉璃街至珠巢街，包括米市胡同，凡

① 龙榆生《中国韵文史》，商务印书馆2010年版，第200页。

② 丁绍仪《听秋声馆词话》卷一二，《词话丛编》，第3册，第2722页。

③ 陈文忠《文学是人学，文论即人论》，《安徽师范大学学报》2012年第1期。

④ 苏汝谦《雪波词》，冯乾编校《清词序跋汇编》，凤凰出版社2013年版，第3册，第1432页。

⑤ 《听秋声馆词话》卷一七，《词话丛编》，第3册，第2792页。

⑥ 按，第一批是嘉庆七年（1802）同科进士陶澍等数人于嘉庆九年（1804）冬组织的消寒会。

四移均不离宣南区域。可以说，“宣南”已是他难以忘怀的情感空间。同时，对宣南人物交游的研究，不能囿于他们在宣南的一时一地。从周氏词中可以看出，无论奉使外任还是回京公干，无论是相遇还是信函，同样会有词作，且往往因一人而念及数人，彰显着他们的集体情谊。

在周氏心中，“宣南”有着家的温馨，是精神的栖居地。如道光九年（1829）在杭州有感圣因寺僧馈食，填《洞仙歌》（斋厨食品）云“宣南人好在，缕款玫砧，隽味频烦玉纤和”，此“宣南人”即妻子沈氏。道光十三年（1833）重过粉坊琉璃街故居，填《满江红》云：“屋角高槐，闲问讯、宣南坊陌。记此地，琴尊跌宕，几年栖息。半刺相忘磨灭后，一家正好团栾日。任旁人，错比子云居，喧尘隔。”由诸同志“琴尊跌宕”处，到下班后的家居之所，“宣南”都是这些“半刺”（微官）们的精神家园。其中洋溢着友朋的浓情厚谊，更凝聚着汉族士大夫的一种集体性的政治情怀，如《临江仙》（一架藤阴留不得）云“十载长安多胜侣，频番酒绿灯红”，《摸鱼子·长至前夕，偕芙初、琴南饮衍石斋中偶述》云“宣南坊里联吟处，只有盍簪堪恋”等。而道光二十七年（1847）词人休官抵开封家中，填《浣溪沙》（其十二）云“十载宣南梦里家。珠巢弹指即天涯。可知宫树不栖鸦”，更是融家庭、身世、朝廷等多层意思于“宣南”这个特殊的文化符号中。

当然，“宣南”情结只是彰显周氏政治情怀的突出表现之一，其友朋之情、同道之谊始终弥漫于周氏酬应、交游词中。如他履职浙江按察使期间，曾“偕董琴南、费新桥两同年泛舟西湖”，面对“时琴南赴云南任，新桥亦将入都”的宦游境遇，填《夜游宫》，落笔便以“一棹停云乍合”统摄同年友相遇之不易，继而以“有约逋梅须共折”表明他们的同道之志，歇拍更云“指心期，但相看，湖上月”，借西湖之景抒写他们的坚贞情谊，亦给人一种政治盟约情怀的联想。除了这种友朋间的正面交往，随着官职上升，还有另一种交游。如道光十三年（1833），周氏从江西巡抚任上回京，填《满江红·都中戏答人问》词，首句云：“万古云霄，问一羽、何人当得？”这显然是都中人借杜甫《咏怀古迹》“三分割据纡筹策，万古云霄一羽毛”称颂诸葛亮句，向此时位列封疆的词人发问。对此，词人既以“戏言”视之，又“戏答”之，将此别有用心之严肃一问以诙谐方式化解。他一方面说“但随分，南州承乏，油幢画戟”，虽居高位，但随遇而安；另一方面云“假节文从炎汉仿，借绯句亦香山觅”，借白居易《行次夏口，先寄李大夫》“假着绯袍君莫笑，恩深始得向忠州”诗句表达自己对皇恩的忠诚，至歇拍“是虎贲，还是蔡中郎，君须识”，将帝王身边精锐武士与东汉末惨遭诬陷而死的蔡邕进行对照，对发问者“反戈一击”。此词虽属周氏词中的另类，却更能彰显其在宦场交游中的谨慎性格及政治姿态。

（二）宦游纪程词的细腻风光与正统史观

周之琦《子夜歌》（剡溪笺）词序云：“自辛巳至丁未（1821—1847），舟车南北，时有纪程之作。公牍余闲，间亦弄笔，积久渐多，家居辑而存之，命曰《鸿雪词》。廿七年宦迹，聊资寻梦云。”^①其实，除《鸿雪词》外，其他词集亦多有纪程之篇。周氏曾奉使太原，外任四川、浙江、广西、江西、湖北等地，无论在任所还是往返京师途中，多留有赏景览胜之词，以词纪程已成为他的一种习惯。与那些多抒写孤行、落魄、憔悴之感的宦游者略有不同，周氏宦游赏景览胜的纪程词正如《子夜歌》所说，“但相看、鸿爪余痕，还是简书，周道寸心堪证”，他走的是周道（官道），乘“南船北马”，一路上题赠不断，“山馆琴樽，河桥风月，那复伤萍梗”，沉浸于对“岷葛吴苑，蛮花郢雪”^②的赏玩感喟之中。对此，清末边保枢曰：“细腻风光，近惟《金梁梦月词》中有此上乘。”^③杜文澜亦言：“浑融深厚，洵为盛世元音。”^④均能看出，周氏宦游多升迁履职，纪程词多写平和心态。

① 周之琦《退庵词》，《清代诗文集汇编》，第540册，第161页。

② 岷、吴、蛮、郢，正好代表周氏外任四川、浙江、广西、湖北四处，足见其以词纪程的创作之思。

③ 《篋中词·今集》卷三引边保枢语，《清词一千首》，第237页。

④ 《憩园词话》卷二，《词话丛编》，第3册，第2865—2866页。

赏景，如《好事近·與中杂书所见得四阕》记述了嘉庆十八年（1813）秋奉使太原期间，由河北获鹿，经井陘，过河北、山西省界的井陘故关，登太行山，至南天门的过程。词人紧扣交通工具对观察视角及文字书写的影响，在运动中抓住瞬间印象，抒情伴着身行心动的节奏，起承转合，渐入佳境。首章起笔，写赴太行山之前奏：“杭苇岸才登，行人乱峰层碧。十里平沙浅渚，又渡头人立。 笏将摇梦上轻舟，舟尾浪花湿。恰好乌篷小小，载一肩秋色。”先舟行，后乘輿，又乘舟，由平坦之地行人群山之中，远眺则“乱峰层碧”“十里平沙”，近观则“舟尾浪花湿”，前后呼应，于点染间烘托出行程所见之山水秋色。次章由友人陈均画扇赠行题诗自然“承接”入山的感受，继而诗意渲染过关后的奇异景致：“诗句夕阳山，扇底故人曾说。好是固关西去，看万山红叶。 翠蛟潭上认题名，屐齿为君折。蓦地鲜花浓处，出一双胡蝶。”上片想象“万山红叶”那开阔绚丽的太行秋色，下片由题扇中“一双蝴蝶”勾勒那精致斑斓的太行图案，虚实中见静动之妙。第三章“转向”山行的飘忽、空邈、艰辛与胆怯：“峻坂怯肩輿，引纜雨行犹弱。几日牵船岸上，只薄帆难着。一声璧月大堤头，旧梦定谁托？何似春风天半，挽秋千红索？”雨中乘肩輿登峻坂，心情紧张，无暇览景，故此阕绘景少，写心多。第四章为合笔，写登上山顶后的感受：“引手摘星辰，云气扑衣如湿。前望翠屏无路，忽天门中辟。 等闲鸡犬下方听，人住半山侧。行蹑千家檐宇，看炊烟斜出。”先举目，次前望，后下视，居高临下的兴奋之情尽在尺幅之中。

览胜，如道光初年任四川盐茶道期间所填《永遇乐·成都武侯祠》云：“天设岩疆，井蛙亡后，形胜谁据。半壁经营，两朝开济。再世生伊吕。炎灵邈矣，讴思未沫，长诵大名千古。任辛毗、军门仗节，笑他畏蜀如虎。 星芒骤落，降笈草草，拱手河山输与。邺下称尊，江东并列，史笔吾无取。锦官城外，云车风马，想像翠华来处。凭君看，荒陵咫尺，尚留汉土。”上片写诸葛亮生前在蜀期间的功绩，下片写其死后蜀地去留以反衬诸葛亮的地位。为了彰显赋咏对象，全词以对比、议论为法，如以割据益州、本有天设岩疆的公孙述这个井底蛙的破灭，衬托诸葛亮的两朝开济之力；以佐商汤的伊尹、佐周武王的吕尚，赞誉诸葛亮的辅佐之功；以蜀汉气运衰竭之象，反衬诸葛亮的青史留名；以魏将辛毗、司马懿等人的“怕”，衬托诸葛亮的威名；以诸葛亮之逝，写蜀国之降、河山之失……“邺下称尊，江东并列，史笔吾无取”，表明自己以蜀汉为正统的历史观，而所以称赞诸葛亮，只因其心存匡扶汉室之念——歇拍云武侯祠西侧有刘备惠陵，便是一个象征！然誉诸葛亮之功，云其“半壁经营”；写其去世，以“星芒”为喻，力透着谨严的学者之思。后来，词人路经邺下，填《汉宫春》（漳水名都）词讥讽曹魏，亦从反面再次呼应他的正统历史观。

（三）哀生悯世词的“藏锋”与“露锋”

周之琦入仕后，大学士曹振鏞器之，“待以国士”^①，然毕竟身处嘉道衰世，游赏山川风物、沉湎清尊画鼓中，时有人生与社会之思，并有前后之别。前期是其居官时期，这部分词“浑融深厚，语语藏锋”^②，“蕉萃婉笃，恤乎若有隐忧”^③，一“藏”一“隐”，正可道出周氏以沉稳为主的仕宦心理。如嘉庆十八年（1813）秋，词人奉使太原，便见识到嘉道官场风气之不正，以及理想与现实冲突的人生困惑，并以内敛之笔写之。《踏莎行》云：

劝客清尊，催诗画鼓，酒痕不管衣襟污。玉笙谁与唱消魂？醉中只想曹腾去。 绮席频邀，高轩惯驻，闷来却觅栖鸦语。城头一角晋阳山，怪他青到无人处。

京官奉使，面对地方“绮席频邀，高轩惯驻”的热情、频繁、周到、高规格的接待，以及主人“劝”酒、“催”诗、“唱”曲的生活，词人却以“醉中只想曹腾去”“闷来却觅栖鸦语”回应，揭示了地方官员的醉态人生，表达了自己克己奉公的节操与襟怀。很显然，此处乃是正话反说的藏笔。回京后，

① 《稚圭府君年谱》，《北京图书馆藏珍本年谱丛刊》，第138册，第136页。

② 黄燮清《国朝词综续编》卷六，《四部备要》，上海中华书局1936年版，第97册，第37页。

③ 蒋敦复《芬陀利室词话》卷一，《词话丛编》，第4册，第3639页。

词人在何凌汉（字仙槎，何绍基父）前辈席上，作《尉迟杯》（欢娱事）词小结此次奉使的得失：“怜刀剪、并州蠹网长系”，以并州刀受挫自喻此次奉使经历，影射太原官场的黑暗；“冷落花名，人谁识珠，泪裹乌栏半纸”，为身为乡试副考官，致使一些良才落第而自责；“但从他、试语初莺，自寻墙外桃李”，又自比初莺，表达对未来事业的信心。词序云，何凌汉对此词“大为击节”，或许就是欣赏周氏作为一名年轻官吏，既内敛锋芒，又展现良吏的坦诚品格与事业追求。

又如，与元代谢宗元名诗《纸鸢》借风筝寓托浩志高举不同，周氏《好事近·纸鸢》词云：“片羽又青云，摇曳半天春色。莫羨儿童牵引，怕东风无力。微茫纤纆系虚空，远影定谁识？偏是绿杨烟外，有流莺窥得。”此词载于《金梁梦月词》卷下，据编次及词中景物时令，约作于嘉庆二十五年（1820）春在京师时。因此有人认为此词是周氏以病乞归，从官场“告退前的内心写照”^①，实为误读。恰恰相反，此词是在早年职位不断升迁这个“好事近”的境遇中含蓄地寄兴“隐忧”之作。全词象征笔法，高空飘扬的风筝表面上自由风光，实质上身心桎梏，满怀忧惧，既怕东风无力托起，又有命悬一线、不知归宿以及流莺冷眼窥伺的危机感，确有“寄兴尤婉”的艺术魅力。

不过，自以病乞休后，因境遇变化，“藏锋”渐趋收起，“露锋”之笔增多。丁绍仪敏锐察之：“大吏经行处所，即非所属，亦必供张迎候。……然亦因人而施，大抵视出处，分轩轻。”^②如周氏自广西巡抚任上病归，经衡阳，阻雪，填《倦寻芳》词云：“倦雁稀迎前度客，昏鸦冷寄谁家树。”“念几日、湘南留滞，窗暝栖烟，灯暗吹絮。”到了湖北这个他曾任巡抚之地，于汉口寄调《蓦山溪》，上片尽写上元热闹氛围，而下片徒然一转：“刘郎重到，往事休回首。冷落旧巢痕，想依然、燕支红透，桃花开早，何处媚芳春，迎过舫、送归鞍，不及长亭柳。”并自注曰：“再日渡江，枉顾者武昌郡丞李君一人而已。”世态炎凉之感，由此可见。经此门庭冷落的刺激，加之晚年遭逢乱世，笔者发现《退庵词》中屡用“一”字，以示其孤独冷落、形单影只的形象。如《退庵词》前四首《醉花间》“一叶扁舟初着岸”，《好事近》“一榻寄吟身，燕子频窥帘隙”，《一萼红》“隔巷遥传，迎门一笑，还似闻苑初移”，《子夜歌》“剡溪笺、一编行记，荏苒岁华重省”，皆为明证。再如《浣溪沙》（客有君房妙语言）“闷思陈事一悽然”、《浣溪沙》（十载宣南梦里家）“一榻沉吟淇上竹”、《河传》（黄鹤）“梦冷鸦啼后，萍漂一叶”，皆十分典型。

在近代史上，周之琦在广西巡抚任上的履职，屡遭论者讥讽，章士钊甚至说他“连任五年，以不办贼闻”。时逢金田起义，除了周氏，尚有前任巡抚梁章钜、后任郑祖琛，均以风雅自命，致使章士钊揶揄他们“殆无一而非金田英雄之功臣”^③。历史的功过是非，暂不评论，但需要说明的是，“合生平之文笔，罔不归乎正谊”^④，关心社会民生也是正统封建官吏的普遍现象。这在周氏从广西巡抚任上退后，反而得到了强化。如咸丰五年（1855）初，《声声慢》词序云“风雨通宵，篱菊损败，感叹成咏”，词云“梦远湘皋，谁念楚些哀弹，重阴望中未解”，就是有感于金田起义全盛、清廷时局如风雨损菊的背景，抒写对曾国藩湘军的崇敬之情，表达对阴霾中南方半壁江山的担心，至结句“松径里，愿香心同保岁寒”，更是其政治态度的坚定表白。同年二月，韶关被围愈急，知州孙福谦请援于江西巡抚，南康知县周汝筠亲带练勇四千来援，五月五日韶州围解。闻此消息，周氏择调《汉宫春》，盛赞其子“汝筠率孙辈频年督勇剿贼，今以韶关解围，均获迁秩，感恩述事，赋此寄筠”，大书自己的欣喜之情。

可见，周之琦以词记录生平境遇，集中叙说仕宦经历与情怀，亦具有将词的功能扩展至文学本质层面的意义。

① 黄拔荆《中国词史》，福建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下册，第402页。

② 《听秋声馆词话》卷一五，《词话丛编》，第3册，第2776页。

③ 章士钊《孙黄遗札密论》，《章士钊全集》，文汇出版社2000年版，第8卷，第340页。

④ 宋翔凤《双砚斋词钞序》，邓廷桢《双砚斋词钞》，孙邦述辑《双砚斋丛书》，民国十一年（1922）家刻本，第2a页。

三 政治身份与“将相兼才调”的格调气度

名臣大吏治词，为词史所常见，然因性情、学问、境地及时势风会不同，词学风貌亦各异。清代咸丰年间，刑部侍郎祁恭恪曾言：“近日词人如邓嶰筠、周稚圭、董琴南辈，皆以倚声擅名当代。”^①不过，同为抚臣的邓廷桢“才气韵度与周稚圭伯仲”，然两人词趣迥异：邓氏亲历亲为近代中国禁烟运动等大事件，激发了他以抚臣身份关心时事的词心，故而他填词能直面现实，以“三事大夫”之身“忧生念乱，竟似新亭之泪，可以觐世变也”（《复堂日记》，第142页），又能本着“我用我法”的创作个性，为词不涉绮语，多涉政治时事，且以东坡词清雅之风为尚^②。与邓氏相比，周之琦外任期间虽有漂泊颠簸之累，休官后有世态炎凉之感，但整体上看，生活平稳，仕途顺畅，长时间位列封疆，因此即便哀生悯世，亦多是在平和心态中抒写隐忧。可以说，“善自得师”的学词路径，以及“能自抒所见，不稍依阿”的个性，为周氏摆脱词学窠臼赢得了机会；而其“廉而不刻，介而自和”“必须躬行”的为人处世之道，以及平稳的生平阅历、境地，又将其拉回“行趋规步”的轨道上。周氏在《匠成翘秀赋》中论及成材用材之道时说：“是故惟材也，循乎尺度；惟士也，因乎遭遇。”^③与此一致，其词学亦呈现出一种既矛盾统一，又以规范谨严为主要特征的艺术走向。

首先，在词学主张上，倡导“托兴新”，然仍以音律体制为规范，将恪守音律视作其选词、论词、填词的共同标准，如其所编《晚香室词录》便“偶引万红友说以校律”（《词籍提要》）。除了恪守音律，显示其沿袭传统的谨严艺术态度，还有其填词亦是举生平境遇自系于词，呈现出一种精细的姿态；其学习填词“善自得师”，亦是其论词、填词善于继承的共同门径；再者，历代学者或言其“短调学温、李，长调学姜、史”^④，短调“有花间风格，下亦不失为小山父子”，长调“得清真家法，下亦不失为草窗”^⑤，“绮丽缜密，直逼草窗”^⑥，或言“唐人佳境，寄托遥深，珠玉、六一之遗音也”^⑦，“词学元张翥，托体甚高”^⑧，无不是在强调周氏“非徒善创，亦且善因”的辩证关系。不过，笔者以为最能揭橥周氏词谨严风貌的，当是程恩泽“稚圭词纯是起承转合，竟可作词中八股”（《中州艺文录校补》，第15页）之论。

对此美誉，周氏自己也“以为知言”^⑨，只是民国以后读者因对“八股”一词心存贬义，多以为程氏是在批评周词，以致夏承焘还专门辩解云：“其实为词不可不讲起承转合，近人学梦窗者，正坐不讲此，并无新意境。”^⑩事实亦如此，“为词不可不讲起承转合”，周之琦在这方面尤为突出。这一特点或见之于组词布局，像前文说过的《好事近·輿中杂书所见得四阙》即是典型之例。或见之于某阙的章法，短调如《好事近·纸鸢》“片羽”二句破题，“莫羨”二句承题，“微茫”二句以设问方式转折，“偏是”二句结题。长调如《扫花游·铁仁山总宪招游城西某氏园》，“粉垣”数句揭示赋咏对象京西某氏园，是起；“翠笺”数句交代铁仁山招游事，是承；“兰绮”数句写某氏园的沧桑变化，是

① 祁恭恪《月波楼琴言·题辞》，陈其锺《月波楼琴言》，《清词序跋汇编》，第3册，第1305页。

② 杨柏岭《邓廷桢的词学追求及其词的创作特点》，《文艺理论研究》2014年第5期。

③ 《珠巢存课》卷上，《清代诗文集汇编》，第540册，第437页。

④ 谢章铤《赌棋山庄词话》卷二，《词话丛编》，第4册，第3340页。

⑤ 《芬陀利室词话》卷一，《词话丛编》，第4册，第3639—3640页。

⑥ 《听秋声馆词话》卷一五，《词话丛编》，第3册，第2776页。

⑦ 《篋中词·今集》卷三，《清词一千首》，第122页。

⑧ 周之琦《心日斋词四种》引陈乃乾语，陈乃乾辑《清名家词》，上海书店出版社1982年版，第7卷，第1页。

⑨ 《稚圭府君年谱》，《北京图书馆藏珍本年谱丛刊》，第138册，第141页。

⑩ 夏承焘《天风阁学词日记》，《夏承焘集》，浙江教育出版社、浙江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6册，第214页。

转；“叹高楼”数句抒发人生苍凉之慨，是合。

当然，周氏词的谨严除了严守格律、八股章法，还体现在绮丽缜密的风格上。一是择调多与主题切合，字面上易于联想。例如，赋春水用《一剪梅》；绘绿阴用《绛都春》；赋车帷用《绮罗香》；咏灯花用《丁香结》；写都人夏日卖冰用《玲珑玉》；记集贤院连雨用《琐窗寒》；述迁居珠巢街新居用《喜迁莺》，等等。二是多用主谓句，或以方位词笼罩情思，以示藏锋笔法。如《瑞鹤仙》自首句“柳丝征袂馆”，经“铜街佩声远”“藤阴翠晚”“珠巢题字，墨晕初干，酒痕微泫”，至歇拍“素襟漫浣”，均是主谓句。《蝶恋花》（门外垂杨千万缕）虽模仿南宋李弥逊《清平乐·春晚》词，但像“门外”“文杏巢里”“紫箫声里”等句，以及“住”“处”“暮”“赋”等韵位用字，均将人物情思限定在一定的时空范围里，明显带有周氏的个性特色。三是多用对仗、对比手法，强化严整气势。如《阮郎归》上片“昨宵同赋冶春词，芳襟暗共期。今朝却是送春时，红螺懒更持”，下片“来又恨，去还思，凄凉花一枝”，昨宵与今朝、冶春与送春、芳襟与红螺、来与去，均一一相对。

其次，周之琦“性好倚声”，窃比李煜，可见有词人词心的一面，但他毕竟是“才人例具用世略”^①，且为宦数十年，此词心中又不免染有簪绂气。于是，一方面，郭则沅评周词“有烟水气，不类台阁中人”^②；但另一方面，郑騫又说周词“稳而庸”^③，讽刺他身为大吏，却采取冷观人间苦难的创作方式。王季友又将其与同时期的龚自珍进行比较，认为：“退庵不及定庵，因为定庵词不论其为儂薄与否，毕竟标出他自己的风格，而周退庵则根本没有自我。”^④虽说郑、王所言均过于严苛，但在一定意义上，确实道出了周之琦仕宦经历及大吏政治身份对其词学的影响。从论词表现出的消解宗派意识的角度来说，周氏作为非以词为业者，能跳出清代词学流派纷呈的门径桎梏，以局外人身份思考；作为中原人士，秉承文化寻根之传统，挣脱出清代词学流派以南方为主的地域限制；而其“门径渐宽”的论词旨趣，似乎也是其“不稍依阿”的人品，以及避免“朋党”、克己奉公的仕宦心理的一种反映。

如果说其词论特点还只是仕宦经历的一种折射，那么他填词喜用“藏锋”，尤擅“八股”章法，以及以仕宦生涯为主要内容，从酬应、纪程到抒写隐忧，从不同侧面构筑了由士子到大吏的情感世界，便是他仕宦人生的一种显在反映。需要说明的是，周氏尚有悼念亡妻沈氏的《怀梦词》一卷。在此卷中，周氏将其与沈氏相识、沈氏病卒、安葬乃至亲人的怀念诸环节一一叙说，忆旧情，绘细节，述现况，虽不乏词人对亡妻的深情厚谊，但依旧遵循“举生平境遇自系于词”的创作路数，以情感故事记录着他的仕宦经历，抒写他的人生感喟。于是，光绪三年（1877），吕耀斗在为沈昌宇《泥雪堂词钞》所作跋中便说，尽管“自古词章皆关比兴”，然“性之至者体自雅，情之至者音自余，固不必寄托，自有悠然繚然之思流于简外”，“近时周稚圭《怀梦词》一册，仿佛有此妙旨”^⑤。后来朱庸斋评周氏《思佳客》（帕上新题间旧题）时，亦针对谭献“唐人佳境，寄托遥深”之评，说“此写实恋情，无关寄托也”（《分春馆词话》，第84页）。

再次，百余年来，论者几乎均在“将相兼才调”格局中评价周之琦词学，其词学地位也呈现出阶段性的起伏变化。其居官时词作得到的评价最高，如叶申芑《金缕曲·谢周稚圭抚军寄示词稿》云：“顾误周郎词坛帅，忽一编、远惠珠盈纸。盥薇读，握兰比。”以知音周瑜喻之，称其为词坛帅才，坦言自己的虔诚膜拜之意；“在桂林，侧闻大中丞稚圭先生绪论及词学”^⑥的张祥河，后来在《心日斋十六家词录序》中称其为“海内词宗”，视为“公今美成”，而“余惨叔夏”；李慈铭认为《怀梦词》

① 钱大昕《潜研堂集·诗集》卷七《送周稚圭同年观察粤西》，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第115页。

② 郭则沅著，屈兴国点校《清词玉屑》卷一〇，浙江古籍出版社2014年版，下册，第385页。

③ 郑騫《成府谈词》，《词学》（第十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

④ 王季友《芝园词话》，中华书局香港分局1979年版，第99页。

⑤ 吕耀斗《泥雪堂词钞跋》，《清词序跋汇编》，第3册，第1644页。

⑥ 张祥河《饮水集序》，《纳兰词笺注》，第418页。

“凄丽妍约，情不自胜，令人诵之回肠结气，几欲掩过纳兰容若”，感慨“昔人谓《饮水词》过于哀抑，决其不寿；若中丞者，富贵寿考，又将何说耶”^①；至程恩泽《题周稚圭前辈金梁梦月词八首》（其一）云“绿酒初尝元献醉，月华如练范公吟。由来将相兼才调，不是吴儿木石心”，在“将相兼才调”的定位中，誉其可比宋代名臣词家晏殊、范仲淹。

此后，论者对周氏的评点便多在“将相兼才调”的格局中展开。当然，好评仍然存在，如早年“犹得于楚幕中望见颜色”^②的杜文澜，于光绪六年（1880）仍称周氏“为词坛名手，纳兰侍卫成容若之后，推为第一人”，自清代以来，“独中丞细意探讨，按节谐声，不失半黍，海内知音者悉宗之”，《心日斋十六家词录》亦“抉择至精，附有手批，籍知功力深厚”^③。此外，像前文已说的谭献、朱祖谋、朱庸斋、严迪昌等人，也给予周氏一定的美誉，不过已不像之前那样极力推尊、几难见微词，而是逐渐跳出以“将相”凌驾“才调”之上的评价态度，多了几分辩证眼光。其中，周氏的将相身份仍在发挥作用，只是逐渐向负面倾斜。这种变化自周氏休官便已开始，如孙麟趾于道光年间编《国朝七家词选》时将周词列入其中，于咸丰初年编《嘉庆以来绝妙近词》时仍加以肯定，但在认识上已有细微变化：“近读陈心泉司马词，韵致秀逸，意随笔转，与中丞分道扬镳。”^④同治六年（1867），曾国藩称晚辈赵烈文“词殆独步，虽名家如周稚圭等，胡能与足下抗”^⑤，已明显质疑周氏的词坛盛名。之后王鹏运“尝谓嘉道以来词人，周稚圭似竹垞，蒋鹿潭似伽陵，而莲生则近容若”，认为“较浙人之专标饮水、忆云为一代词宗者，似为平允”^⑥。左绍佐延续此说，称“嘉道后，周稚圭与此两集（按：蒋鹿潭、项鸿祚词集），可云鼎足”^⑦，但并未把握半塘旨归。因为半塘曾对项鸿祚、周之琦进行比较，认为：“莲生称词之时，正周稚圭中丞提刑两浙，同时同调，特以仕、商异路，绝无往还，其品甚高。此事固关襟抱，何往不然。”^⑧经商的项鸿祚词品高于身为大吏的周之琦，其潜台词不言自明。至吴梅云，因周氏“社课特多”，即此才调而论，“已不如水云矣”，“且悼亡诸作，专录一卷，虽元相才多，未免士衡辞费”^⑨。

当然，这么说，并非否定周之琦对词史的贡献。在一定意义上说，周氏确实是近代词风转变中能自述己见的代表人物之一。朱庸斋云：“乾嘉年间，浙西派与常州派迭兴，角持一代词坛，独周之琦一人，能截断众流，巍然自立，斯亦难能可贵矣。”（《分春馆词话》，第84页）本文认为，周氏《晚香室词录》《心日斋十六家词录》着眼于令曲、长调各自优胜，精选佳作，实为词选一派；其论词绝句以诗歌论词，且于浙、常诸派之外，独抒所见，当为近代词坛有创见者；其纪程之作，融宦迹入词，对近代士人社会心理有认识意义，亦有开拓词境之功；身为中州人士，善自得师，而无门户之见，可接中原之统，平生仕宦蜀、浙、鄂、桂等地，提倡风雅，对近代地域词学的发展亦为有功之人。

[作者简介] 杨柏岭，安徽师范大学中国诗学研究中心教授。出版过专著《龚自珍词笺说》等。

（责任编辑 马昕）

① 李慈铭《越缦堂读书记》，中华书局1963年版，第917页。

② 《憩园词话》卷二，《词话丛编》，第3册，第2865—2866页。

③ 杜文澜《金梁梦月词跋》，《清词序跋汇编》，第3册，第1178页。

④ 孙麟趾《绝妙近词凡例》，《清词序跋汇编》，第4册，第1144页。

⑤ 陈乃乾《阳湖赵惠甫烈文先生年谱》，《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辑》，台湾文海出版社1983年版，第99辑，第58页。

⑥ 王鹏运《忆云词甲乙丙丁稿识语》，《清词序跋汇编》，第2册，第879页。

⑦ 左绍佐《忆云词甲乙丙丁稿识语》，《清词序跋汇编》，第2册，第878页。

⑧ 王鹏运《忆云词甲乙丙丁稿识语》，《清词序跋汇编》，第2册，第878页。

⑨ 吴梅《吴梅讲词》，东方出版社2007年版，第211页。